

【历史学研究】

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线的回顾与反思

郑清坡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20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线是发展,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问题。围绕此主线引发了一系列争论,由此也大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及新制度经济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脉络演变。此外,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对小农经济较强的解释力也显示出了其影响力。但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任何单一理论体系都难以对此过程予以完全有效的解释。

关键词:农村经济研究;小农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1-0054-07

回溯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对农村经济的关注又是其中格外凸显的部分。农村经济包含内容很多,有关论著和资料可谓浩如烟海,许多学者对20世纪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状况多有述评^①。但以往述评并未涉及百年来农村经济研究的主线,缺乏对其核心问题的系统反思。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发展,即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才能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繁盛和现代化进程。几乎所有主要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如何改造传统小农经济展开,而对此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主张。无论是生产关系变革论,还是以制度、市场和追求高利润的动机来激发农村经济发展,它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本文即对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线做一述评^②,并试图在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中得出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反思,以供学界同仁讨论和批评。

民国以前我国只有农学,而无农村经济学,更乏对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至清末民初,在华的外籍教授和外交官开始对中国农村经济予以较多的关注与研究,并展开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到20世纪20年代有关调查研究开始迅速发展繁盛。究其原因,则主要为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已经成为当时许多学者争论的中心。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村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的极大部分,因此农村经济的研究对于整个社会性质的认识自然占有重要地位。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学在民国时期尚属新兴学科,且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质,而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又“头绪万端,发轫伊始,基础未固,各方需要资料每感欠缺,尤于运用之际,未能发挥其切实之功效”^③。因此,农村经济研究必然要对农村进行调查以求得资料数据。而“农村社会调查,须先自农家经济始,再进而调查农村经济。若经济之构造明

收稿日期:2012-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世纪农民日常生活视域中的制度变迁:以冀中为中心的调查研究”(11CZS034)

作者简介:郑清坡(1978-),男,河北定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乡村史、中国社会经济史。

①有关20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状况可以参见相关综述: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王小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李金铮、邹晓昇:《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绪论“研究的进展与理论的困惑”一节,分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对中国乡村经济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温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述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姜爱林:《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对土地政策的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黄荣华、马勇华、王友明:《近20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模式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陈胜祥、温锐、杨丽琼:《近年以来新中国“三农”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此外,有关20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综述文章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农村经济。

②限于篇幅,本文基本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文论著为讨论范围,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外文论著将另文讨论。

了,于上层之教育、文化、宗教等之一切问题,即易了解”^[2],且“农民经济果能充裕,则农村社会中其他各种问题,皆可迎刃而解”^[3]¹⁶⁸。调查清楚农村经济现状,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日形凋敝,使得关心农村问题的学者,知道“因袭陈说”决不足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不得不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关于农村经济“事实的分析”和“理论的探讨”也就引起当时学者特殊的兴趣。民国时期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方式^[4]:一是重视具体事实,进行农村调查,整理各种零碎材料,想用归纳的方法来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个经济结构;另一种重视抽象理论,遍览关于农村经济理论探讨的世界名著,想用演绎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农村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再就是强调事实与理论的结合,一方面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具体事实,另一方面由于事实的分析,理论的内容也就跟着充实起来。而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学的主流,并基本形成了两种主要的不同研究路径。其中以卜凯(J. L. Buck)等为代表的农村经济学家侧重于生产力因素的分析,而以陈翰笙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农村经济学家则更侧重于生产关系因素的分析。美国学者瑞斯金(Carl Riskin)将其分别形象地称之为“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5]。由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就,不仅在当时,更对此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由卜凯主持的两次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及根据调查撰写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集中体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看法。在卜凯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村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问题。而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乔启明根据卜凯农业调查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由于人口过多、农场面积狭小、生产效力低和交通不便等原因,事实上已低到极限;要提高农民生活程度,必须先排除这些障碍。为此他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一是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由工场吸收部分农场人口,节制生育,使人口不至过密;二是通过降低人口密度,扩大农场面积,增加农户产量和收入;三是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四是发展交通,使农产物销路畅通^[6]¹⁶³⁻¹⁶⁴。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有学者认为,乔启明的结论很具有现代学术水平,即便是在今天,许多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大多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并未脱离乔启明所提议的范畴;而这并非乔启明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见解^[6]¹⁶⁵。

与发展、振兴都市工业救济农村主张不同的是,以章士钊和梁漱溟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则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以促进工业。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乡村建设在政治上是由散而合,在经济上就是由农而工。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是直接办工业,而是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个方面刺激工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互为推进,实现工业向农村分散和农业工业相结合以及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的理想。他认为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与近代西方国家由商业到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7]³⁸⁸⁻³⁹⁵。此外,还有主张先农后工,首先使农业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也有持调和论点者,主张农工并重,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更有主张“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二者相辅相成,以及建立现代化工业和推动合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等^①。

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则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就《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和《昆厂劳工》等。在这些研究中,作者分别揭示出不同地理环境以及耕地面积下农村社区经营方式的差异,并提出了从家庭手工业、作坊工业到工厂工业等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以及城市近郊农村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商品农业的道路。以上各社区分别代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类型,即便是现今仍具有典型意义,基本可以涵盖农村的主要经营方式。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基本上以生产力要素为研究对象,虽然也关注到了生产关系因素,但相比较而言更侧重于生产力的状况。对这种研究农村经济的方法,陈翰笙等给予了批评。他们认为卜凯等的研究无视中国农村的社

①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79~680页。此外李培林等从两大视角(改良与革命)四条路径,对早期中国农业工业化问题的提出进行了总结。在改良视角下,有两条路径:一是从生产要素的路径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另一条是从传统文化的路径提出工业化问题。在革命的视角下,也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另一条道路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184页)。

会问题,未能揭示农村经济崩溃的根源。在陈翰笙等看来,农业经济学或农村经济研究是有其阶级性的;因此,农业经济学的内容应该集中于其中心问题——农业生产关系上,而不是技术即生产力上;更进一步说,根据他们的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惟有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方能正确地深刻地求得农村问题的核心^①。陈翰笙等就是要通过对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找寻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他们认为这些压迫中国农民主要的因子一经铲除,非但农民可以活命,我们的民族也便有翻身独立的一日。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想指导下,陈翰笙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对农村经济进行调查,观察认识农村社会各种生产关系,明了它的一般运动法则,从事这种特殊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后来编辑的《〈中国农村〉论文选》和《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两个集子中。

然而更大的争论却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论战在《中国经济》与《中国农村》两个杂志之间展开,前者称“中国经济派”,后者称“中国农村派”,他们论战的代表作均收入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双方争论的文章,都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国经济派”的理论逻辑是: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生产力使生产关系进步,土地分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就过去了。今日中国农村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因此,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的中心是资本问题,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中国农村派”的理论逻辑是:生产关系的演变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现阶段农村的核心是土地分配问题,以及它所隐蔽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应从土地所有形态和性质、地权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农业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四个方面来研究土地分配问题,并从农村市场、农业成本和雇佣劳动等方面研究农业经营^②。这种理论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究竟是发展农业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用改良主义办法能不能发展农业生产,使中国农村经济免于破产”^③。

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吸取前一阶段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为了彻底解决革命性质与道路问题,他们认真地对农村社会展开马克思主义式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④与张闻天^⑤的调查最具代表性。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到鲜明的阶级性,发动土地革命,变革生产关系,从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许多调查文章成为以后中共各级组织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一点在其1933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和划分农村成分的标准,其中特别是对地主和富农作了区分,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还被作为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而张闻天在调查中更注意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明确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强调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⑥。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农民具有“两种保守性”,作为劳动者可能会跟无产阶级走,接受社会化的改造;作为私有者又可能跟资产阶级走,发生商品生产者的自发倾向。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的小农,“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⑦。因而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不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继承,并付诸于实践。

虽然经过了土改,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后果,必然是资本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经济研究的状况,此后长达30年的农村经济研究基本是围绕生产关系的改造展开的;在实践中,农村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几个阶段。与20世纪上半期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热

^①以上参见冯和法的《庸俗农业经济学批判》、钱俊瑞的《〈中国农村〉发刊词》,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②两派的理论逻辑主要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5年)中王宜昌的《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和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③毛泽东的主要农村调查成果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张闻天的主要调查成果收录于《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

闹纷繁相比,建国初的30年国内农村经济研究则要冷清得多。有关农村经济的研究也常常只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土地制度方面,对生产力方面却关注不够。对此,李根蟠讲到,“五六十年代存在一般只讲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偏向。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虽然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但毕竟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11]17}。

不过,此时期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1969年美国学者珀金斯发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在作者看来,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中国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大大地提高,这也是在14世纪和19或20世纪之间,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至于制度结构的变革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在这段时期的中国并不明显^[12]。同一时期,马若孟也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一书,在书中作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对农民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支持农业生产,家庭农场的产出和生产力本应增长更快。而对于土改,马若孟却认为它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因为这一改革消灭了私有财产,从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新的动力^[13]。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农村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生产力”,特别是市场因素。对这一研究的转向,黄宗智评价到,“新一代学者开始寻找伴随着商品化而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证据。随着蔓延着的对集体化农业的非议,他们回到他们想到的唯一的替代途径:市场和资本主义”^{[14]3-4}。而这样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只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陆续发表。

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自亚当·斯密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坚信,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在利润最大化驱使下使资本主义农场的合理经营,才可以实现农业的商品化和现代化,舒尔茨便是其中主要代表。在舒尔茨的研究中,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主具有同样的“理性”,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来追求最大利润。因此,改造传统农业要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波动来刺激农民^[15]。舒尔茨的同事D·盖尔·约翰逊更进一步讲到,私有制和农场的自主权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在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后才能激发他们对土地投资的热情。他还批评1980年后的中国农村改革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土地所有权没有给予或出售给农户家庭,而只是把土地使有权分派给农户,农户并不清楚他们使用每个地块的权限有多长。因此,虽然农民收入增加了许多,但是却很少进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投资活动^[16]。舒尔茨学派关于小农经济的观点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有相当的影响,许多人都把市场化的小农家庭农场认作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并强调市场刺激下追求利润的小农的创造性成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成员甚至在1987年就率先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取向”^{[17]24}。在对农村改革30年经验总结时有学者再次强调,农村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市场化、非农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四个方面,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推进^{[18]420,36}。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并传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制度内在性探求中国农村经济的变革,并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对集体化经济^①的不成功,学者们分别从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过高以及有效激励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克服。有学者即认为,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运营机制上表现出激励不足,在资源配置机制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就围绕微观运营机制和农业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机制两方面展开^{[19]35}。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再次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变为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对新制度形式的出现,林毅夫则借助诱发性技术创新和诱发性制度创新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舒尔茨的理论。他以监督成本和退出权来解释集体化的低效率,并认为农民自发选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于它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业中劳动监督困难的问题,使农民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其努力程度相对应,因而具有巨大地调动劳动积极性和提高产量的效果^②。有学者也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

①有关建国初30年农村研究成果可以参见相关综述,这里不再详述。王丹莉《统购统销研究述评》、叶杨兵《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评》,这三篇文章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综述还可见刘德军《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研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张寿春《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②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一书中《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与《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两篇文章。蔡昉等则认为,恰恰是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成为计划经济实践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和表现。而扭曲激励机制的微观经营制度和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内生的传统体制模式的必然结果。相应地,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关系格局,有赖于对这个传统发展战略及其派生出的传统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蔡昉、王德文、都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1页)。而蔡昉与林毅夫等曾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该书较早对赶超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进行了详尽论述。

制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经过10年分权化的渐进改革,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20]。

然而新的经营制度虽克服了原有制度的许多弊端,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制度的普遍推开,也引发出了新问题。对此,舒尔茨认为,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中国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但制度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生产中所有组织问题,怎样在家庭的基础上改进生产组织,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提高专业化程度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应当解决的问题^[21]。更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制约下的村社内部化的制度安排问题和一定宏观制度条件下农村的制度创新^{[17]20-21}。正因为如此,围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争论从一开始就一直未中断过,至今仍在继续。

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主要有三种主张^①:一是主张实行土地国有永佃制,二是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三是主张不断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关于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过四次争论。一是根据1985—1988年粮棉产量徘徊,认为家庭承包经营潜力已尽,要退回去;二是借着完善双层经营的名义,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由,想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石;三是在搞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认为农户小规模的经营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随意把农民的承包地收归集体,实行统一经营;四是在实现“两个飞跃”的讨论过程中,把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第二次飞跃对立起来,借以否定家庭承包经营^[22]。然而,对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地位的争论并不会因此停止,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仍会相机出现。

虽然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对家庭承包经营地位做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改革以来形成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23]。更有学者指出,无论何种制度创新的模式设计,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最适宜家庭经营的制度安排原则不能动摇;而其在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某种制度缺陷,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应当更多地归结于制度外的经济变量约束;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所表现出来的制度绩效难以估量^②。有的学者还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有助于农村资金的积累,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开启了农村商业化和契约化的“数目字”管理时代^[24]。

虽然各种主张互有差异,以致针锋相对,但在农村改革以增量的方式渐进推动的性质上的认识却是共通的,并认为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不竭的动力。

在上述两大理论体系之外,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则显示了比较强的解释力。在恰亚诺夫看来,农民农场是一种家庭劳动农场,这构成了所有结论的基本前提,并且这种经济组织在许多国家中较长时期存在依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其发展道路则是通过合作制将农村经济的相当一部分融入社会化生产之中,表现为利用了全部农业科学与技术成果的新型农村^[25]。黄宗智将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并列为农民学的第三大理论传统——实体主义,并在具体研究中对其进行了发展。在黄宗智早期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中,认为中国的小农具有为生存生产、追求利润和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面貌,并提出“内卷化”和“过密型”概念^③。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宗智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生产单位即家庭历5个世纪的商业化、百余年的近代化以及30余年的集体化仍顽强存在;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增长,是“过密型”增长(或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的;这一地区农村的真正发展,是在1980年农村工业化以后^[14]。“过密化”概念提出后立时引来很大争议,并受到了美国加州学派和国内发展论者极其强劲的挑战。

在随后的研究中,黄宗智从历史角度回顾了当前“三农问题”的经济和制度性来源,认为在当前的承包制下,务农人口基本仍处于长时期以来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迫使许多农户同时依赖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临时工的“半工半耕”方式来维持生活需要^[26]。进而他还批驳了对于中国农业本身的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农业的低收入唯有在更高度城镇化与工业化之后,减轻人口压力,建立规模农业,才有可能解决;无论是主张维持当前的土地制度,亦或要求实行土地私有化,他们都认为小规模农业潜力十分有限^[27]。对中国农业的出路,他认为,其在于当前

①参见廖洪乐等《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研究》前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有关土地制度变革的各种具体主张还可参见黄荣华、马勇华、王友明《近20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模式研究综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参见许经勇《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刊载于《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许经勇在《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六十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用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审视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认为资本原始积累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全过程,目前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则有待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的建立。

③参见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

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而改革以来的大规模非农就业以及近年来人们的食品消费转型,两大趋势的交汇,正赋予小规模农业以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使中国农业有可能走出“过密化”困境^[28]。

三

综上所述,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发展,更确切说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问题,并呈现了贯穿始终的强烈现实感和问题导向特征以及两种意识形态化和二元对立的存在。

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对现代化诉求的进一步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改造和发展逐渐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民国时期人们就逐渐认识到,农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而“农村问题的中心就是农村经济问题”^{[29]435};“欲求复兴农村之繁荣,必先改良农村之经济。盖农村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皆将成为空谈也”^{[31]161}。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乡战略有所改变,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格局又开始向城市倾斜,工作重心又向城市转移,农民增产不增收及负担沉重的问题浮到面上。到90年代中期,“三农”问题日益凸现,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浮出水面。人们开始注意到,“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及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解决“三农”问题便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政界和学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其中许多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争论在20世纪各个年代都曾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争论的焦点则主要集中于农民农场的经营方式和土地制度。由此也大体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脉络演变:一是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小农经济唯有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通过合作道路走向集体化才能使农村获得发展;二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及新制度经济理论,他们则认为,小农是“理性经济人”,传统农业的改造只有在私有制下通过市场竞争刺激小农向农业投资,从而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则只能实现有限干预。上述两大理论体系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二元对立态势。很多学者常将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与上述两大理论体系并列,但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实践中恰亚诺夫的理论并没有占到主流地位,无论就研究群体还是政策影响力都无法与两大理论相比。虽然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并未构成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一条主要脉络,但其对小农经济较强的解释力仍显示出了其影响力。

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和实践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研究及改造农村经济时,由于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由于过多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其后合作化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阶级划分与阶级动员起了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国家的经济职能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新制度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其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也越来越凸显。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黄宗智批评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接受原教旨市场主义,忘记中国的实际,认为市场是全能的和唯一的经济发展道路^{[30]526}。

家庭农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中国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虽然百余年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未因此改变小农经济的某些特性,其家庭经营方式与农户经济行为保持了顽强的任性。在经营方式上,农民家庭“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从近代不同程度地延续至今,并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下去。小农的经济行为则是处于变化之中,为生存亦或为利润生产则依其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不同,但其都是力争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无论近代还是现代中国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之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仍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则在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正是这种人地关系才造成了小农经济发展的韧性。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解释都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有其最初的适用范围与目的。因此,如果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不结合实际,而一味生搬硬套理论模式,终归不能正确有效地解决问题。面对中国这样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现实,任何单一理论体系都难以对其予以完全有效的解释。事实上,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自身遵循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径发展演变。因此,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应结合实际,总结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郑林宽, 陈文理. 福建省农产贸易之研究[C]//农业经济研究丛刊总序. 永安: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调查室, 1946: 7.

- [2] 阎文学. 曹韦二村农家经济概况之调查[J]. 河南大学农学院院刊, 1936, 1(1).
- [3]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乡村社会卷[G].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 [4] 薛暮桥. 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J]. 中国农村, 1934, 1(1).
- [5] 陈意新.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1): 118-124.
- [6] 李培林, 孙立平, 王铭铭, 等. 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重庆: 重庆乡村书店, 1939.
- [8] 薛暮桥.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序: 第一辑[Z].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 [9] 张闻天. 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0]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1] 中国史学会, 云南大学. 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2] 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13] 马若孟. 中国农民经济: 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 1890—1949[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14]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5] 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16] D·盖尔·约翰逊.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7] 温铁军.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 [18] 张晓山. 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 [19] 黄季焜. 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 30 年中国农业与农村[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8.
- [20] 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 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5(6).
- [21] 林毅夫. 舒尔茨教授访谈谈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J]. 经济学动态, 1988(9).
- [22] 廖洪乐.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研究·前言[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 [23] 陈锡文.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60 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陆学艺, 王春光, 张其仔. 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25] A·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导言[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26] 黄宗智. 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 读书, 2006(2): 30-37.
- [27] 黄宗智, 彭玉生.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4): 74-88, 205-206.
- [28] 黄宗智. 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 读书, 2006(10): 118-129.
- [29] 李景汉. 定县土地调查: 上[J]. 社会科学, 1936, 1(2).
- [30] 黄宗智. 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Review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 Research Mainline for Centuries

Zheng Qingpo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ain line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 research is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Triggered a series of controversy around this main line, and thus also the general context of the evolution of peasant economy theory of Marxism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new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In addition, the Chayanov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on peasant economy shows its influence. However, practice shows that any single theoretical system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for Centuries.

Key words: rural economy research; economy theory of Marxism;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new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Chayanov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责任编辑 张春生)